

往被美其名曰“精耕细作”，甚至发展到地耕得越深越好，耕地遍数越多越好的地步。江南地区粮食作物三熟制和二熟制的争论，只集中在“三三得九”还是“二五得十”上。只问产量，不问收益。同时，物化劳动的消耗也大量增加：71年与59年相比，我国稻谷产量增加14.5%，物资消耗费用增加264%，如果再加入各类农用物资廉价降价供应这一因素，这二个数字之间的差距还要更大些^④。四川省70年代粮食用种量比解放初增加一倍，一年用去的种子达五十多亿斤，但是产量却没有翻一番。四川大足县的粮食成本高达0.15元，而国家收购价当时却是一角左右。我国著名的粮食高产区苏州地区，亩产二千斤以上地区的农民收入要低于亩产千斤地区农民的收入^⑤。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的盲目增加，使农业生产成本大大增加，农业生产经济效益大大下降，农民收入不能增加，生活不能改善，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无谓地浪费，发展到后来的“文革”中围湖造田，毁林种粮时，形成的破坏和损失已是极其严重了。

综上所述，“递减律”是客观存在的，违反了它，如同违反其它经济规律一样，也要受到惩罚。所以，在理论研究和现实经济活动中认识这一规律，恢复这一规律应有的地位，实在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

④② 《论商品经济中农业的特权》，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

③ 《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载《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

程小青和“霍桑探案”袖珍丛刊

程小青（1893—1977），苏州人。幼年家庭很清苦，但特别爱读小说，尤其是侦探小说。早年，他主要从事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同时，对他不满意的已出版的蹩脚的侦探小说译文，都重新作了翻译。后来，他开始模仿柯南道尔的方法进行侦探小说创作。他塑造了一个中国的“福尔摩斯”霍桑，通过霍桑的朋友包朗（模仿福尔摩斯的朋友华生）来述说案情，用出人意外，又合乎情理的方法侦破了许多疑难大案。以后，他逐步由借用外国小说中的情节发展到以中国的事情为素材进行创作。在当时被人称为“中国的柯南道尔”。

从1941年起，上海《世界书局》把程小青所撰写的“霍桑探案”收集起来，编成了一套袖珍丛刊。书为64开小本，一共三十册：《珠项圈》、《黄浦江中》、《八十四》、《轮下血》、《裹棉刀》、《恐怖的活剧》、《舞后的归宿》（又名《雨夜枪声》）、《白衣怪》、《催命符》、《矛盾圈》、《紫信笺》、《魔窟双花》、《两粒珠》、《灰衣人》、《夜半呼声》、《霜刃碧血》、《新婚劫》、《难兄难弟》、《江南燕》、《活尸》、《案中案》、《青春之火》、《五福党》、《舞宫魔影》、《狐裘女》、《断指团》、《沾泥花》、《逃犯》、《血手印》、《黑地牢》等。每册都有程小青的“自序”，在最后一册末，程小青附了一篇《论侦探小说》。

这套丛书每本都再版过，有的曾再版四次。最后一次印刷是在1947年4月。

这套丛书，大都暴露了资本家及黑势力的罪恶，为下层人物鸣不平。同时，对当时中国的司法制度和保安机构也进行了抨击。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中国畸形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在今天看来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小骏）